

杨匡汉 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 / 杨匡汉主编.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5

ISBN 7 - 5382 - 7077 - 9

I. 中… II. 杨…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5075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82 千字 印张: 9½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忠孝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封面设计: 吴光前 王 萌

版式设计: 熊 飞

定 价: 22.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	杨匡汉			
撰 稿 人	杨匡汉	洪子诚	孟繁华	李兆忠
	古远清	魏朝勇	卢建红	朱崇科
	王赢杰	陈 林	曾平牙	郭冰茹
	黄艺峰	岳 姿	黄汉平	李凤亮
	张 泉	王世诚	田美莲	杨 飏

主 编 简 介

杨匡汉，学者，文学批评家。1940年生，上海市宝山人。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赴内蒙古工作，历任新闻记者、大学教师。1979年应聘回北京。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当代文学研究室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现代诗学及台港澳文学研究。已出版《诗学心裁》、《时空的共享》、《共和国文学50年》等著述二十余种。

内 容 简 介

本书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内涵、生成和发展进行了学理的阐释。对当代文学研究作了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论述，在充分肯定新中国 50 年文学实绩的基础上，分析了研究对象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多元以及与相关学科的联系，还特别介绍了国外汉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以资借鉴。本书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前景也作了理论预测，指出了它与时俱进、走向开放的时代特征。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概述	1
第一节 新中国 50 年文学风貌	1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与生成	5
第三节 学科的“当代性”	12
第四节 初具规模的学科建设	14
第二章 当代文学史的产生和发展	22
第一节 权威的阐释	22
第二节 浩劫后的“拨乱反正”	32
第三节 “二十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写作	43
第四节 当代文学史：重写的实绩	59
第三章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象的拓展	77
第一节 从大陆文学研究到台港澳文学研究	77
第二节 华文文学研究的延伸	89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研究	98
第四章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多元方法	110
第一节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批评的互补	110
第二节 从庸俗社会学到社会历史批评	119
第三节 美学批评	127
第四节 文化批评	136

第五节	新批评·····	146
第六节	叙事学·····	154
第七节	女性主义批评·····	164
第八节	精神分析方法·····	174
第九节	后现代主义批评·····	184
第五章	中国当代文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195
第一节	当代文学与当代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人类学 的联结·····	195
第二节	当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关联·····	207
第三节	当代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	217
第六章	世界汉学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36
第一节	50至60年代的研究·····	237
第二节	70年代前期的研究·····	245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的研究·····	249
第四节	对“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展开与深化·····	257
第七章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前景·····	280
第一节	旧的研究模式的解体·····	280
第二节	面对共同的文学时空·····	285
第三节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交汇·····	290
第四节	学科的开放与开放的学科·····	293

第一章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概述

第一节 新中国 50 年文学风貌

“1949~2000”的半个世纪将长存于中国人民的记忆中。五十年前，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在暴风骤雨中诞生，从此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备受欺凌的屈辱历史。站起来的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变革，为建设共和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一切的宝贵来自伤痕和代价。经历“文化大革命”浩劫后的 80 年代的拨乱反正和 90 年代的理性探求，人民共和国更加风鹏远举，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迅跑。历史的丰碑上赫然镌刻着四个大字：中国，进步！在共和国摇篮里共同成长的人们，把光荣和梦想写进彩虹，自然，也会把对祖国的承诺带给每一个早晨。

半世纪沧桑演进了历史巨变，五十度风雨创造了文学中国。作为时代琴弦上的搏动与变奏，新中国文学五十年以其宏伟叙事，也以其划时代的进步性和不可逆性，在苦难与奋争中拥有了自身持续发展的潜质、器度和能力。它象征着一种信念，塑造着一种形象，诠释着一种启迪。也因此，从学理层面上总结其经验教训，探讨其荣辱得失，便成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无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在评价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时，某些海外论者认为“中国大陆 40 年代到 70 年代根本没有什么文学作品”，80 年代以后似乎只发现了沈从文（其成就主要在现代，新中国成立后则埋头

潜入“古代服饰史”之研究)、北岛(已移居国外)、高行健(已移居国外)等极少数作家作品,其余的都因所谓“翻译问题”进入不了世界性的视野。除了意识形态的偏见,至少说明海外学界对中国大陆的文学实绩还缺少足够的理解和了解。

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应当承认,在中国大陆,“共和国文学五十年”不但不是“文化空白”,而且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就文学世界而言,因意识形态、社会建构之不同而有迥异的文学思路和创作风貌,此乃常识性问题。中国大陆从40年代到70年代、从新生的共和国被封锁围闭到大步走向改革开放,巨大的社会变动化作纸上烟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的血汗和智慧,从曲折坎坷中成长的文心和人格,毕竟把徘徊在欧罗巴的幽灵赋之于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真真切切的形象。整整半个世纪,中国内地作家可谓前仆后继,咨嗟咏叹于民族国家之忧乐,寄怀纵目于河山风景之兴替,努力以铿锵之声与时代足音共鸣,履践着自认的庄重使命,历经“火浴”而把焦灼与痛苦、奔突与追求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中,印证流年风雨的人性世态,并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古老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动中的种种面容,其间的酸甜苦辣与创造的悲欢,是一般外人、更是异国同行所难以想象的。

新中国文学五十年的成就,可以说是一部伟大的叙事。这半个世纪,中国大陆文学的各个门类,其作品数量之可观,其形式风格之多样,其题材主题之丰富,其作者读者之广泛,都是前半个世纪不可比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据统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9年为401人,1999年达6647人;文学作品总量1950年为156种,1999年达14587种;文艺刊物1949年为18种,1999年达537种;文学作品印数1950年为214万7700册,1999年达1亿4996万册。再以长篇小说为例,现代文学阶段(1919~1949年)出版的总量为1200多部,及至当代,1949~

1966年间为320部,80年代达1000多部,90年代更进入旺季,1995~1999年每年平均出版500部以上,共和国五十年的长篇小说总计近5000部之多。诗歌创作到90年代也相当繁富,新体旧体诗词每年有7万多首发表,一年的作品就超过《全唐诗》收集的数量。自然,数量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但至少可以证实,中国依然是个泱泱的文学大国,绝非某些人所说的“文化空白”或“文学走向断裂与死亡”。

更重要的是,共和国文学对“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传统有所继承与发扬,而且经五十年的奋发努力,迄今已在下列八个方面塑造了“共和国文学”的新形象:

(一) 题材与体裁的新开拓。创作领域从狭小走向广阔,上下五千年,纵横八百里,天上地下,古代当今,城乡边陲,战争和平,都纳入当代文学家的视野之中,指涉范围之磅礴,想象发端之瀟漫,可谓浑茫无极。典雅的传统语言、活在唇舌上的民间话语以及外来的现代词语之融会兼具,使当代中国的白话文学更趋成熟与丰赡,文学种类与体裁至本世纪末已相当完备。

(二) 主题与思想的新境界。历史的记忆肯定要留下作家深邃的思想,留下令人震撼的从心灵深处迸射出来的语言。共和国文学中作为主导的主题与思想,从民主革命的思想高度上升到社会主义的思想高度,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崇高精神流贯于作品之中,给人民以信心和向上的力量。

(三) 人物形象的新典型。在共和国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过去受欺凌、受挤压的普通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成了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众多劳动人民的形象中,英雄模范人物又占据重要地位。按照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共和国文学创造了一批比较成功的,其性格与命运、思想和艺术并进的新的典型形象。

(四) 风格与形式的新发展。尽管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受教条

主义的影响，公式化概念化一度盛行，但一批忠于生活忠于艺术的作家依然保持了文学的自主与创造精神，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不失时代意味又深具探索勇气的文体实践，在自由竞赛中，使风格与形式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大陆上已出现诸多艺术倾向相似、风格相近的作家群。

（五）创作队伍的新面貌。中国内地的当代作家已是“四世同堂”。1952年9月全国文协改为中国作家协会时，作家不过400多人，迄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加上各省、市、自治区作协分会会员，从事创造的队伍超过2万人，可供作品发表的园地——文学刊物加上报纸的文艺副刊已逾千家。老作家时有新篇，中青年作家活跃于文坛，新生代作家在榛莽中露出芽苞，女作家的成群涌现更是史无前例。这支值得信赖的文学大军，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六）受众广泛的新环境。由于五十年来坚持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实践，共和国文学已拥有广泛的接受者，形成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读者群。长篇小说《红岩》共印行400万册、《保卫延安》初版发行近100万册，即使是在90年代市场经济冲击下，贾平凹、莫言等作家探索性的艺术小说也印行数万册乃至数十万册。尽管时至今日作家们在寻找和确定各自特殊的“受众”，但多元选择的可能性，合起来的文学读者成千成万。

（七）民族文学的新生机。除汉族外的五十多个兄弟民族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长期受到歧视和摧残，有的民族文学则濒临泯灭的边缘。共和国使少数民族文学得以新生，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创作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呈现了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特异风采。少数民族文学作品1950年仅出版3种，1999年少数民族图书总量达4108万册之多。与此同时，各兄弟民族还整理加工了诸如《格萨尔》（藏族）、《江格尔》（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等脍炙人口的英雄史诗，颠覆了西方

关于“中国无史诗”的歧见。

(八) 理论批评的新突破。中国内地的文学批评曾一度靠“复制”与“搬用”前苏联模式过日子,此一批评格局,至八九十年代有了多方位的突破。批评家们广泛运用历史—美学—文化的观点激扬文字,且向全人类的智慧开放,开始凭自己敏锐的理性思维与艺术鉴赏力为作家提供真切的审美判断。文学批评也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获取了新的进展,大话、空话、套话、训戒之言和“八股”之调为人们厌烦,在阅读与诠释中那份独特的创造性理解和识见越来越受到尊崇。

总之,由新中国土壤孕育的文学生命之树,经历风吹雨打,毕竟健旺地生长起来了。那种“今不如昔”的观点,那种“共产党领导,对文学来说是一种灾难”的观点,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可以告慰新文学先驱们的是,他们当年所追求的文学理想和美学目标,许多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且被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作家、批评家们向前推进了。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与生成

“中国当代文学”概念的生成,不仅是文学史家对文学现象的“事后”归纳,而且是文学路线的策划、推动者“当时”的“设计”。因而,“当代文学”概念的构造,和这一概念所指称的文学的生成,应是同步的。

“当代文学”和“新文学”、“现代文学”等,是相互关联、无法截然分开的概念。大致在 50 年代中期以前,有关“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文学史论著和作品选,大多使用“新文学”名称。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1932),《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1933),《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王丰园,1935),《新文学概要》(吴文祺,1936),《中国新文学大系》

(赵家璧主编, 1935~1936)等。同样使用“新文学”名称的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 虽然晚至1982和1986年才正式发表, 但都产生于二三十年代, 是作者在学校里授课的讲稿。在这期间, “现代文学”很少见到, 个别以“现代文学”命名的著作, 也主要作为“现时代”的时间概念使用。这种情况, 一直继续到50年代一段时间。除了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外,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1951, 下卷1953), 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 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1955), 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卷, 1956), 都是如此。但是, 自50年代中、后期开始, “新文学”的概念便被“现代文学”所取代, 以“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著作, 纷纷出现。与此同时, 一批冠以“当代文学史”或“新中国文学”名称的评述1949年以后大陆文学的史著, 也应运而生。可以看出, “现代文学”对“新文学”的取代, 是为“当代文学”概念出现提供“空间”, 是在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划分方式, 为当时所要确立的文学规范体系, 通过对文学史的“重写”来提出依据。而这种依据, 主要来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观察文化问题的方法论和基本前提, 其主要点是强调物质存在, 政治、经济革命对于精神、意识和文化革命的“决定”作用, 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 然后, 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这为左翼文学界开展的文学运动, 和与这一运动紧密相连的对文学的历史叙述(文学史研究), 确立了应遵循的原则。从文学史叙述的方面, 则可以称为多层的“文学等级”划分。毛泽东对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形态的分析, 从文化分析方面, 必然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 与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成分和阶级政治

力量相对应,也必然有不同的(主要以阶级性质来区分)、有不同等级地位的文化形态。“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反动的,“应该被打倒的东西”,反映新的经济基础和先进阶级的意识的,则是“新文化”。第二,“新文化”也不是一个“整体”,同样也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构成。各种成分(力量)在新文化“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不是对等的,有主导与非主导、团结和被团结、斗争和被斗争的结构性的区分。其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因素”“起决定作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则属于需通过斗争、团结而予以争取、改造的因素。第三,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一样,都要经历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因而,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过是向着更高目标的过渡阶段;“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过渡”性质的,必然要发展为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这一思路,是赋予“新文学”以新的涵义(后来便用“现代文学”来取代),而作为比“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更高阶段的文学(它后来被称为“当代文学”),也在这一论述中被设定。50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对于“新文学”概念的取代,正是在文学史叙述上,从两个方面来落实《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一是新文学构成的等级划分,二是文学“进化”的阶段论。“现代文学”被明确为指“五四”文学革命到1949年的这一时间的文学,而1949年之后的文学,已具有不同的性质,需要从概念运用和文学分期上加以确定。50年代初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连同刘绶松、蔡仪、张毕来等50年代的著作),虽然仍使用“新文学”的概念,但确已属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畴。不过,《史稿》虽然“力图”贯彻《新民主主义论》的指导思想,却还不是那么彻底。较为彻底表达的,应是周扬等组织、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如前所指出的，“当代文学”概念的生成，不仅属于文学史学科体制的范围，因而需要从文学运动开展的过程和方式上去考察。从40年代开始，延安文艺整风和延安文学实验，这一被左翼文学主流派看作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是“当代文学”的“直接渊源”，“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周扬语）。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在“新中国”——“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独立民族国家的出现被预告和被感知的情势下，把这一文艺方向推向全国，成为全局性的文学构成，是40年代后期左翼文学界关切的主题。当时，有“资格”和能力为文学确立“全局性”规范，对文学进行“选择”的，只有左翼文学力量。这种支配性的地位的取得，一方面靠左翼文学的威望和影响，另一方面靠正在迅速取得政权的政治力量提供的保证。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左翼文学界推动“当代文学”生成所作的“选择”，是对作家作品和文学“派别”进行“类型”的划分。分析的主要尺度，是文学观念、作家作品的“阶级性质”。这直接从左翼作家把文学看作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中导出，来自于他们对文学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关系的理解。左翼文学力量首先在文学界（这在当时开始称为“文学阵营”）中划分敌、我，构造了“革命作家”、“进步作家”（或“中间作家”）和“反动作家”的概念（见写于1948年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文）。“中间作家”（同时使用的还有“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民主主义作家”、“进步作家”等称谓），指虽然赞同新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对革命抱同情、靠拢态度，但“世界观”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观念与革命大众文艺存有分歧的作家；他们必须改造自己的文艺观和写作方式，才有可能参与对“当代文学”的创造。列入反动作家名下的，有与国民党官方有直接关系的潘公展、张道藩等。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的沈从文、朱光潜，以及萧乾等，当时也被列入“反动”的行列：这应该说与沈、朱、萧等人当时在国共两党斗争中暧昧的政治态度，和他们对左翼文学的激烈批评有直接关系。类型划分的另一方面，是针对文学思想和创作现象。“封建性”的、“买办性”，“浅薄的人道主义”的，“超阶级的人性”，对“‘圣洁的爱’与‘永恒的美’的追求”，“方法上”过分强调技巧的倾向，“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等等，是用来否定“压抑”范围相当广泛的创作倾向和文学派别的尺度。这种区分，不仅将左翼文学置于文学最高的等级（这是包括胡风等在内的左翼文学各派别都赞成的），而且在左翼文学中，将“解放区文学”置之优于国统区左翼文学的地位（这却是胡风等所不愿承认的）。“市民文学”和“通俗小说”等，一般也被放在“市民阶级与殖民地性的堕落文化”之中。体现在冯至、沈从文、师陀、路翎、钱钟书、张爱玲、巴金、曹禺、穆旦、郑敏等这一时期创作中的创造力的多种可能性，在严格筛选中疏漏不取，而拒之于“当代文学”的构成之外。

进入50年代，“新的人民的文学艺术”已宣布出现。但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开始，经济基础的变化并未完全实现，因而，在1952年周扬说，“目前中国文学，就整个说来，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文学”，但“已经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这时作为新的文学形态和文学时期指称的较通用的说法，是“建国以来”的文学。50年代中期，在“当代文学”的构造上是个重要的时间。1956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胜利”，使文学界主持者感到有理由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学”。而近十年时间，文学也似乎有了拿出来陈列的成绩。因此，“建国以来”作为独立文学时期的这一早已存在的意向，有了明确指认的时机。1959年，邵荃麟在《文学十年历程》中较早使用“社会主义文

学”的概念，说它“在前一阶段的末期（指“革命民主主义文学”阶段末期，即40年代后期——引者）已经孕育成熟了，当革命一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就以“生气勃勃的姿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量”。1960年的第三次文代会上，周扬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在“正式文件”上确定了1949年以来“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这样，“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区别，成为两个文学时期划分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周扬等急迫地组织“现代文学史”编写，以使他们在“反右”运动中对文学的“两条道路斗争”的叙述“正典化”。一批由研究机构 and 大学编写的“当代文学史”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和作为一个文学时期的地位，在这时得到不容置疑的确立。

“当代文学”的特征、性质，是在它的生成过程中描述、构造的。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讲解放区文学成绩的报告，为“当代文学”的描述，建立了特殊的话语方式，并在以后得到补充和“完善”。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当代文学”的“崭新”特征的说明，通常列举的方面是从“内容”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主要表现对象，工农兵群众成为创作中的主人公；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则是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追求，肯定生活、歌颂生活的豪迈、乐观的风格成为主导的风格；“作家队伍”构成的变化，工人阶级作家成为骨干；文学与人民群众建立了从未有过的密切联系，并在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等等。这种由周扬等创立的叙述模式，由最初之一的当代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1963年版）所采用，在三十多年后的90年代，继续为最新成果的当代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华文学通史·当代部分》）所继续。

50年代所确立的“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后来不断发生